

文章编号: 1006- 4346(2000)04- 0001- 09

“十五”和2010年人口发展报告

田雪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十五”和今后10年,是中国人口变动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到201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人口质量有显著提高,人口年龄、性别、城乡结构得到合理调整的目标有望实现。立足于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全局,宏观决策选择尤应重视:坚持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战略,突出“稳定低生育水平”主题;稳定现行生育政策,谋求适应市场经济利益导向改革;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发展非义务教育产业;加快人口城市化步伐,扩大社会消费总需求;把握年龄结构老龄化进程,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关键词:“十五”和2010年;人口目标;决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Population Development Report for Tenth Five-year Plan and 2010

TIAN Xue-yua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Ten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next ten years are the key period of Chinese population change and development. By the end of 2010, population targets are to control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size within 1.2 billion people, to enhance the population quality to great extent, and to improve the age-sex structure and the imbalanced urban-rural distribu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how China could stabilize low fertility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Key words Tenth Five-year plan and 2010; population targets; alternatives of policies

中国生育率在经历了70和80年代的持续下降后,90年代以来仍然保持下降态势,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总和生育率 $TFR < 2.10$,净再生产率 $NRR < 1.00$),成功地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的“第一次着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过渡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再生产类型。21世纪前10年面临“第二次着陆”实现人口零增长的关键时期,也是开辟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

收稿日期: 2000- 04- 18

作者简介: 田雪原(1938-),男,籍贯辽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方向:人口学、人口经济学。

发展道路的关键时期。科学的确定人口目标和作出战略决策选择,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1 人口变动与发展趋势、目标和特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人口科学发展的春天,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活跃起来。由笔者主持的“六五”国家重点《2000年的中国》首篇“2000年中国的人口和就业”研究,提出并阐发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当前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战略方针(田雪原,1984)^[1],经过60多位专家和学者讨论论证,得到普遍认同。其间和其后学术界不少论著问世,大都赞同“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并以“控制”为重点的战略方针。如今历史推演到世纪之交,这一战略方针的使命是否完成和让位于新的其他战略方针?我们认为没有并仍需继续坚持这样的战略方针,只是其重点由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过渡到稳定低生育水平而已。基于这一战略方针确立的“十五”和2010年人口变动和发展的趋势、目标,其体现的基本特征和要求,主要是:

1.1 人口数量增长受到有效控制,增长势能进一步削弱

根据国家计生委提供的资料和联合国、美国人口咨询局等的估计,近年来的中国总和生育率(TFR)在1.80左右,已低于2.10更替水平许多。在这一水平基础上并考虑到稳定低生育水平宏观要求,国家计生委、联合国中位预测的人口变动,如表1所示。

表1 2000~2020年中国人口变动预测

	2000	2005	2010	2020
方案 I				
总人口(亿)	12.73	13.28	13.80	14.70
TFR	2.0	2.0	2.0	2.0
出生率(‰)	16.42	14.78	14.89	12.80
自增率(%)	0.97	0.79	0.77	0.48
65+(%)	6.8	7.5	8.0	11.0
年龄中位数(岁)	29.7	32.0	34.0	36.4
方案 II				
总人口(亿)	12.78	13.26	13.72	14.54
TFR	1.84		1.89	1.90
出生率(‰)	14.6		14.2	13.6
自增率(%)	0.75		0.69	0.58
65+(%)	6.8	7.5	8.1	11.5
年龄中位数(岁)	30.0	32.4	34.5	37.3

资料来源:方案 I 为国家计生委预测,参见: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 1999[Z], 1999, 北京;
 方案 II 为联合国预测,参见: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8 Revision [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9

国家计生委和联合国的两种预测可谓大同小异, 方案 II 更接近实际一些。1999 年全国人口 125 909 万, 比 1998 年增加 1 099 万; 按照方案 II 2000~ 2005 年年平均增加 960 万, 2005~ 2010 年年平均增加 920 万, 人口数量增加衰减与出生率、自增率下降同步, 使人口增长势能得到进一步释放, 为 40 年代实现人口的零增长铺平道路^[2]。

1.2 人口质量显著提高, 人力资本存量增加

人口质量学术界有“二要素”论与“三要素”论之争, 即由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教育素质“二要素”构成, 以及加上道德素质“三要素”构成的不同观点。这里取共同的“二要素”, 进行预测和分析。

1.2.1 身体素质的提高

考察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有多种指标, 最主要的是婴儿死亡率和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我国婴儿死亡率下降很快, 已自本世纪 40 年代的 200‰ 左右下降到 1990 年人口普查时的 32.9‰, 目前多数估计已下降到 30‰ 以下; 相应的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也由 40 年代以前的不足 40 岁, 上升到 1990 年的 68.6 岁, 目前已超过 70 岁。^{[3][4]} 国际上一般认为我们对婴儿死亡率的统计数字偏低, 联合国估计 1995~ 2000 年中国的实际婴儿死亡率在 41‰, 联合国人口基金主席 N. 萨迪克估计该指标 1999 年为 38‰; 人口预期寿命的统计指标稍有偏高, 联合国估计 1995~ 2000 年为 69.8 岁, N. 萨迪克估计 1999 年男为 67.9 岁, 女为 72.0 岁(表 2)。我们认为联合国的预测更符合婴儿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长的一般规律, 中位预测变动趋势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1995~ 2020 年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预测

	1995~ 2000	2000~ 2005	2005~ 2010	2010~ 2015	2015~ 2020
婴儿死亡率(‰)	41	36	32	28	25
预期寿命(岁)	69.8	71.2	72.4	73.5	74.5
男	67.9	69.1	70.3	71.3	72.3
女	72.0	73.5	74.7	75.9	76.9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8 Revision [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9. Nafis Sadik. 6 Billion, The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9 [R] New York: UNFPA, 1999.

1.2.2 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

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 可从文盲半文盲人口的基本扫除、享有中等教育人口比例达到较高程度和具有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上升三个层面上, 作出预测和说明。

(1) 文盲半文盲人口基本不复存在。抽样调查表明, 1998 年 15 岁以上人口中有文盲半文盲 14 852 万, 占 15 岁以上人口 15.8%, 占总人口 11.9%^[5]。1982 年人口普查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 22.81%, 16 年来平均每年下降 0.7 个百分点。以此速度外推, 则 2005 年可下降到 7.0%, 2010 年可下降到 3.5%; 若加大力度每年以 1.0 个百分点速度下降, 则 2005 年可下降到 4.9%, 2010 年已不复存在。即使以介于二者之间速度下降, 2005 年文盲半文盲将减去大半, 2010 年也基本不复存在。

(2) 具有中等教育水平人口大幅度上升。1998 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8.9%, 升学率

达到 94.3%,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则达 50.7%, 说明小学、初中普及率较高, 9 年义务教育取得成效, “十五”和 2010 年将继续有所提高。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将显著上升, 预计 2005 年可上升至 60% 左右, 2010 年可超过 70%, 城市将基本普及高中教育, 农村在普及初中义务教育基础上, 经过努力, 1/3 左右升入高中应当是可以做到的。

(3) 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例增长较快。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大学(包括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增长速度, “十五”和 2010 年间增长速度应适当加快。如此, 以 1998 年全国具有大专水平人口 3 180 万, 占总人口 2.54% 为基期, 以年平均上升 0.1 个百分点递增, 则 2005 年可达 4 296 万, 占总人口 3.24%; 2010 年可达 5 131 万, 占总人口 3.74%, 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指标。

如能实现上述人口质量提高目标, 将有力增加人力资本积聚量。所谓人力资本, 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的质量总和, 是相对物化资本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十五”和 2010 年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人口数量过剩、质量不高的矛盾, 加速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进程, 不过在总体上中国人口质量仍不够高, 人力资本存量同庞大人口数量相比还很不相称。

1.3 人口结构的适时调整, 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

寻求人口自身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还必须适时掌握和调整人口结构变动。人口结构包括年龄、性别人口自然结构, 城乡、就业、消费、产业等人口经济结构, 婚姻、家庭、民族、文化、宗教等人口社会结构。结合中国实际, 21 世纪前 10 年影响较大和需要适时调整的人口结构, 主要是:

其一, 加速走向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变动“天地之间有杆秤”, 出生率就是“定盘星”。出生率升高导致年龄结构年轻化, 出生率下降引发年龄结构老龄化。中国人口出生率自 70 年代以来长期持续的下降, 终于在 1999 年将年龄结构送进老年型, 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先步入老龄化和老龄化速度来得比较快的国家。由于人们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 80 和 90 年代出生率变动把握不准, 均不同程度地低估了老龄化进程。本文表 I 所列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预测, 老年人口比例和年龄中位数等指标均比 1996、1994 年以及更早一些的预测有较大的提高, 说明早一些的预测对老龄化估计不足。现在看来, 联合国预测 2005 年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 7.5%, 2010 年再上升到 8.1%; 年龄中位数将分别提高到 32.4 岁和 34.5 岁, 是可能的和比较现实的。需要明确的是, 这仅是步入老年型初期的预测, 中期和后期老龄化速度还要快, 达到的水平也要高一些。

其二, 城市化步伐加快的人口城乡结构。中国人口城乡结构比较落后, 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 1998 年市镇人口 3.79 亿, 占 12.48 亿总人口的 30.4%^[6]; 同年, 世界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 45%, 发达国家达到 75%, 发展中国家也达到 38%。^[7]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实际的人口城市化可能要高一些, 因为中国市镇人口是按照市镇辖区人口统计的, 对于那些进城务工经商农民说来, 尽管他们已是事实上的市镇人口, 但是由于户籍仍在农村而被排斥在市镇人口之外。目前农村进城务工经商人数估计从 5 000 万至 8 000 万不等, 如取其中间值 6 500 万; 再取其中间值一半即 3 250 万为在城镇较固定的事实上的城镇人口, 则 1998 年市镇人口比例当在 33% 左右, 2000 年当在 34% 之上。以此为基期的人口城市化预测, 见下表 3:

表 3 2000~ 2020 年人口城市化预测

市镇人口	2000	2005	2010	2020
方案 I				
(亿)	4.38	5.08	5.78	7.12
(%)	34.3	38.3	42.1	49.0
方案 II				
(亿)	4.38	5.15	6.06	8.38
(%)	34.3	38.8	44.2	57.6

资料来源: 方案 I 参见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1996 Revision[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8; 方案 II 为笔者预测, 沿用 1957~ 1998 年中国统计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 3.3% 外推计标

上述两种预测中, 方案 II 按照 1957~ 1998 年市镇人口年平均增长 3.3% 外推预测, 未来一二十年保持这一增长速度是可能的。如此, 可在 2010 年消除同发展中国家(43.6%)的差距, 2020 年消除同世界总体城市化水平(56.7%)的差距, 达到或略高于这一水平。

其三, 趋于正常的性别结构。中国历来属性别比较高国家, 50 年代以来提倡男女平等, 性别比有所降低, 80 年代加强人口控制和 B 超得以应用发展以后, 不同地区曾一度出现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 近年来监管力度加大又有所好转。在高度重视和加强管理下, 出生性别比可望回到正常值, 总人口性别比可望稳中有降。联合国预测 2000 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 105.9, 2005 年 105.4, 2010 年 103.9^[8]。

2 宏观发展战略的决策选择

最近,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全面地阐述了解决人口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是解决未来人口问题的纲领性文献。这里我们从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角度, 对关系决策选择全局的几个重要问题作出比较分析。

2.1 坚持总体人口发展的战略与突出“稳定低生育水平”主题

在现代化建设中谋求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必须坚持既定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并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总体发展战略。那么步入 21 世纪初这一发展战略的重点要不要转移, 如转到人口素质提高方面呢? 回答是不需要, 重点仍需放在数量控制上。70 年代以来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举世瞩目成绩, 现今人口增长势能有很大的削弱, 但是即使是强弩之末的势能也不可小视, 国内外的预测表明, 2040~ 2050 年人口数量达到 15~ 16 亿时方能实现零增长。亦即未来 40 多年里中国人口还要增加 3 亿左右, 人口压力有增无减, 数量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数量问题解决得好, 则可因为出生和未成年人口消费的减少而增加积累, 加快教育、卫生、城市建设、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 直接促进人口文化教育素质和身体素质的提高, 促进人口城市化和平安通过人口老龄化严重阶段。从个人和家庭讲, 父母可

以因为少生子女而发展自身,有利于素质的提高;子女也可以获得更多学习和深造的机会,提高文化教育和健康素质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可见,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主题的人口数量控制得好,可以有力地发挥出对人口素质提高和结构调整的作用,是“控制”、“提高”、“调整”的核心和关键环节。这样说并不否定“提高”和“调整”对“控制”的作用。相反,“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数量控制,要求相应的人口素质的提高:生育率与人口文化教育素质成反比,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就是生育率的降低;生育能力同人口年龄结构息息相关,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生育率有明显差别,适度的人口老龄化是通向人口零增长的必经阶段,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和人力、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有助于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素质的提高和适宜的结构调整给数量控制以积极影响,是稳定低生育率水平必要的人口条件。^[9]

从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口是关键。中国素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于世。然而远者且不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物自然资源有减无增,唯有人口从5.42亿增加到12.59亿,净增7.17亿,增长132.3%;因而人均自然资源大幅度下降,耕地、淡水、森林资源下降尤甚,面临沉重的人口压力。人口大量增加出于“土里刨食”生存需要,毁林开荒、变牧为农、围湖造田盛行,造成水土流失、气候变得恶劣、水旱灾害加剧;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和噪音“三废一噪”污染加重,大气、水、土质量下降,生态平衡受到越来越大的破坏,传统的发展模式变得不可持续。资源短缺、环境变坏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而人口数量膨胀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1世纪前期是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实现“三步走”发展目标的决定性历史时期,人口增长不仅具有一般的人均效应,而且应当看到具有“加权效应”;人均消耗自然资源加权增加,人均消费加权增加,如果环境保护不能有效加大力度,污染也会加权增加。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切实控制人口增长,对于保护资源和环境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立足点所在。^[10]

对于东西部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东部生育率相对更低一些,一些省、市10几年前便达到总和生育率 $TFR < 2.1$ 和净再生产率 $NRR < 1.0$,上海市已连续几年实现人口负增长。西部生育率相对要高一些,除个别省份达到或略低于更替水平外,一般省、区距低生育水平有较大距离,因而那里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下降到低水平。据此,“稳定低生育水平”应对东西部提出不同要求:东部要扎扎实实地稳定,缩小直至消除低生育水平与群众生育意愿之间的差距,消除反弹势能,在稳定前提下寻求逐步下降,向零增长过渡。西部第一步是把较高的生育率降下来,达到低生育水平;第二步做低生育水平巩固稳定的工作,经过较长时间努力后再寻求向人口零增长的过渡,是先降后稳、降中有稳。无论东部还是西部,都要明确70年代以来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历史已经过去,今后是稳中有降、降中求稳,确保生育率的较低水平的相对稳定和向零人口增长的平稳过渡。

2.2 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与寻求利益导向改革

“稳定低生育水平”要以现行生育政策的稳定为前提,任何政策上的波动,不管是收紧还是放宽,都会引发抢生、超生,造成生育率反弹升高。不过对“稳定”也不能作一成不变的绝对理解,当前各省、区、市大多规定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结婚者可生育2个孩子,有7个省规定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结婚者也可生育2孩子,我们认为这种“微调”是合理的和必要的。1980年中央召开人口问题座谈会时曾反复讨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确认既非权宜

之计,也非永久之计,而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到新一代独生子女结婚时可生育 2 个子女。现在看来这样做并不会危及到既定人口目标的实现,表 1 所列人口预测总和生育率变动,国家计生委方案 I 为一直保持 2.0,联合国方案 II 2000~2005 年为 1.84,2000~2010 年为 1.89,2010 年以后一直保持为 1.90,同 2.0 接近。这两种预测以及许多其他国内外预测均不同程度考虑到独生子女结婚“微调”放宽问题,允许独生子女生育 2 个子女在预测假设条件之内。这样做对防止过度老龄化,用“软着陆”办法释放人口增长势能,缓和和化解生育指标与群众生育意愿之间的矛盾,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如何稳定和实施现行生育政策,无疑要运用以往成功的经验和做法,诸如各级领导亲自主抓、负总责的经验;以宣传教育、避孕节育和经常性工作为主的“三为主”的经验;加强基层队伍建设的经验;增强法制观念和依法行政的经验等,继续发挥政府行为的主导作用。可以预料,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十五”期间,贯彻落实现行生育政策还必须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这一点必须明确。同时也要看到,在知识经济来临和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发展时代,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趋于成熟情况下,从长远发展趋势上看,随着人口增长的控制和现行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政府职能有弱化的趋势,利益调节市场导向有强化趋势,我们在强调政府主导行为时要积极寻求利益调节的改革。在独生子女奖励、集体收入分配、农村土地承包、宅基地划分、小额贷款、科技扶持以及城乡子女入托、入学、培训、就业、住房等实行一定的利益倾斜,有效增大独生子女和其他计划内出生子女的效益,诱导人们自愿选择少生优育道路。

2.3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与发展教育产业

当代经济、社会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证明,人力资本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实施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证。

“稳定低生育水平”需要加强计划生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998 年全国计划生育经费人均 4.04 元,由于经费不足,避孕药具技术更新跟不上,规划中的县、乡两级服务站建成比例低,不能满足广大育龄夫妇避孕节育要求。据中科院国情小组计算,人口增长率每降低 0.1 个百分点,人均 GDP 可增长 0.36~0.59 个百分点,旨在降低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的计划生育投资,仅从经济投入产出观点看,也是产出很高的人力资本投资^[1]。建议国家在每年追加固定资产投资时,确保计划生育投资能够同步或比同步稍高一些的增长。

用于增进人口身体素质的医疗、卫生、保健投资,也应同步增长;用于提高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各类教育投资,应得到更快增长。目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左右,多年来这个比例没有多少变动;发达国家一般占到 5% 左右,印度、泰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高出我们许多。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教育的发展和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必须下决心改变。这不仅为提高人口文化教育素质所必需,而且对于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有特殊意义。计算一下即可明了:如果将教育经费支出提升 0.5 个百分点,占到当年 GDP 的 3.0%,即可增加教育投资 380 亿元;提升 1.0 个百分点,可增加教育投资 755 亿元,拉动内需动力何其强大!据调查,目前全国 6 万亿居民存款中,约 1/3 是父母为子女上学准备的,问题在于教育发展滞后,人们欲消费而无门,至今教育还基本为“卖方市场”所垄断。增加教育投资,满足人们教育消费需求,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在于发展除义务教育外的教育产业。即使义务教育,也应打破“大锅饭”式管理办法,建立相应的利益调节机制,提高教育劳动生产率。通过以大力发展教育产业为主增加人口智力、健康、生育等的人力资本投资,换取人口素质的提高和数量增长的有

效控制,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上去、人口下来”可持续发展的一剂良策。

2.4 加快人口城市化与扩大消费总需求

计划生育工作之所以被称作“天下第一难”,难就难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不高情况下,生育率却要下降到较低水平,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反差”。然而将社会分成城乡考察,情形有很大不同:虽然城市生育率低许多,但是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相对水平更高一些;农村生育率高一些,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相对水平更低一些。城乡比较,农村“反差”更大,城市“反差”小得多,一些大中城市“反差”已接近消失。目前全国农村人口统计部门报告占近70%,城乡人口大致“三七开”,我们认为在67%左右,城乡人口“1比2”。前已叙及,即使如此也比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落后一截,与发达国家更不能相比,落后的“二元经济”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质量的真正困难所在。而且由于城乡差距拉大,以消费为例,城乡居民消费比(以农民消费=1)由1978年的2.9,扩大到1998年的3.3,绝对额由相差267元扩大到4288元(当年价格)^[12],成为社会总消费不足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个根本原因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农民消费水平低基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基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基于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过剩,目前估计过剩农业劳动力在2亿左右。因此尽快将农业过剩劳动力及其附属过剩人口转移出去,主渠道是转向城镇工商业,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是降低生育率和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提高人口素质,扩大社会总需求拉动内需一项治本的方略,“十五”和2010年规划应当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着力推进。

2.5 把握人口老龄化进程与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人口预测表明,生育率稳定在现有较低水平,200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10.8%,年龄中位数将上升到32.4岁,至2010年两者将分别达到12.2%和34.5岁,处于老龄化前期;其后20年为加深阶段,2030年时也将处于较高水平;2040~2050年达到峰值阶段,2050年60岁以上比例可达29.7%,年龄中位数升至43.7岁,虽然稍低于发达国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居于最高水平之列,人口老龄问题届时将成为严重社会问题之一。立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方面要恰当估量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社会负担、储蓄、投资、消费、伦理、文化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解决好老龄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实行可靠的老年社会保障,特别是经济保障和健康保障。

关于老年经济保障,由于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之间形成的“时间差”,也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从摇篮到坟墓”全方位社会保障的种种弊端,我们不可能实行由社会完全包下来的做法,而应坚持积极发展社会供养,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适当组织老年再就业自养,实行“社养”、“家养”、“自养”相结合互相补充的养老保障制度。现在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一些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严重,职工工资发放不出去,养老金的发放和按比例基本养老金的缴纳难以兑现。为此,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1991年《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责令企业按《决定》条款缴纳,滞纳金以法论处,企业破产也要将拖欠养老金列入统筹解决问题之一。二是养老覆盖面窄,城市多数职工享有,农村绝大多数无缘,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扩大。在农村要大力发展储蓄性养老保险,保证投保基金增殖;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规定最低生活水平线,推行“反贫困”养老保障战略,使全体老年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关于老年健康保障,需要更新社会观念,长寿并不是主要目的,长寿+健康才是真正的目的。要保障老年生理、心理、活动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良好健康状态,生理健康是基础,医疗保

障改革要坚持到位。城市医疗制度改革在不间断进行,需要考虑适当向老年人口倾斜;农村中合作医疗几起几落,应根据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和医疗条件,制定不同的收支标准和合作制度,逐步建立起稳定的保障网络体系。

2.6 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与促进民族繁荣

西部开发战略是改革开放向西推进、加快西部发展的战略,故可称为西进战略。从人口角度讲,是东部地区“三低”向西部延伸、加快西部人口转变的战略。由于多年来东西差距拉大,西部大开发不可能像爆破那样“轰”的一声“经济上去,人口下来”,而需要树立长期转变、循序渐进思想。在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现代财富评价中,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人力资本,中国西部的比较优势在自然资本。然而自然资本再丰富也是稀缺的,更何况西部自然资本结构性短缺相当突出。西部大开发不能滥用自然资本,而只能走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上多作一些文章。对待“民族繁荣”要有一个正确认识,仅仅是民族人口数量上的增加,还是质量上的提高和生活上的改善?在 21 世纪前 10 年无疑更强调后者,而不是前者。要实现以经济发展和人口质量为核心的民族繁荣,应当摆脱“贫穷——生育——贫穷”的不良循环,因而“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在生育数量上应适当放宽,不同人口规模少数民族也应有所不同;为此,要大力普及优生优育知识,减少出生儿缺陷比例;要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努力提高人口文化教育素质,不断为大开发输送人才;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将经济、社会发展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结合起来,与保护资源和环境结合起来,营造大西北、大西南的秀美山川^[13]。

参考文献

- [1] 2000 年的中国(研究报告之一)[R]. 北京: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1984- 12 1- 4
- [2]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8 Revision* [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9 138- 139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编辑部. 中国人口年鉴 1995[Z].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5
- [4] 人民日报,1997- 01- 18
- [5]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1999[Z].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 [6] 同[5]
- [7] Nafis Sadik. *The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8*[R]. New York: UNFPA, 1998
- [8] 同[2]
- [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2000 年 3 月 2 日)[N]. 人民日报,2000- 05- 08(1).
- [10] 田雪原. 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M].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207- 211
- [11]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 2000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91- 96
- [12] 同[5]
- [13] 田雪原. 西部大开发中实施人口转变的决策选择[R]. 中国社会科学院. 要报,2000- 03- 30, (39): 1- 4

[责任编辑:顾鉴塘,陆杰华]